



苏联顾问 A·B·勃拉戈达托夫在中国大革命期间曾在中国待了两年多，自 1925 年 4 月从莫斯科来到中国，至 1927 年 7 月离开。他在中国的两年多，恰是中国大革命轰轰烈烈起来又迅速跌入谷底的两年多。他根据自己亲身经历所写的回忆录《中国革命纪事（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详细记录了他在冯玉祥部国民军和在国民政府中的所见、所闻，以及他对中国和中国革命的思考，为更加全面地了解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和中国共产历史提供了重要视角。

勃拉戈达托夫虽然没有在当时力量还不够强大的中国共产党身上过多着墨，但通过他的记录，我们仍能真切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中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依然是山河破碎、积贫积弱，列强依然在中国横行霸道、攫取利益，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苦难和屈辱之中”。有了这样直观而深刻的认识，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多么艰巨，而在革命的队伍里，中国共产党与同盟者相处又是如何艰难，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红色政权来之不易”。

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直接任务——打倒军阀

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封建军阀是中国革命最直接的对象。对此，勃拉戈达托夫看得十分清楚，他一针见血地说：中国的军阀们，“把私人利益看得比社会利益还重要”。为了能将私人的利益最大化，军阀们什么原则都可以不要。勃拉戈达托夫愤慨地说：“将军们主要出于个人利益和暂时的考虑，不断从一个军事政治集团转到另一个集团。广大的士兵都是顺从地跟着供给自己吃穿的这个将军跑，而在这个将军失败以后，又投向另一个将军，有时投向将军的敌人。”“决定投到哪一方和啥时投奔主要取决于何者好处大。”勃拉戈达托夫无奈地总结：“对于军阀将军来说，战争就是生意。”

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军阀从不考虑社会利益，遑论国家利益，在他们治下，只有无休止的征兵和捐税。征兵无疑是为了不断扩充自己的实力以



——读 A·B·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

□ 邵建斌

抢占更多的地盘，征税则是为了满足不断扩大的军队和军阀个人不断膨胀的欲望。封建军阀所发动的一次又一次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使广大人民深陷水深火热之中。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当时，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以其理论的清醒和彻底，把“打倒军阀”作为革命的首要目标提了出来，并矢志不渝为之奋斗。这是以往任何政治力量不曾有过的。

中国共产党直指问题的总根源——帝国主义

中国革命面临的另一大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对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的灾难，勃拉戈达托夫评价说：“中国在经济上受着帝国主义列强的控制，它们将它瓜分为很多势力范围。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经济的投资，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已达二十二亿五千万美元。这大大超过了中国本国的投资，确保了外国人在中国工业中的垄断地位。”除了经济上的剥削外，帝国主义还对中国人民进行着政治上的压迫。勃拉戈达托夫也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帝国主义“依仗签订的的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很多城市里都建立了特区——租界”，“他们在这些地方不受中国法律管辖，成了

这块土地的真正主人。租界实为国中之国。外国列强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警察局，组建了自己的市政府和军队”。当勃拉戈达托夫途经上海前往广州时，这种不平等给他留下了更为直观的印象：在上海，“宏伟的高楼——大楼的玻璃窗夺目，擦得发亮的黄铜构件闪闪发光——标明外国垄断资本家正对这里主人的落后技术和内部混乱行使着权力。而在中国区里，街道狭窄，楼房低矮，还有些简陋的土坯房和竹房子”。

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深刻地认识到：此时的中国，帝国主义是造成一切问题的总根源。他们的在华资本和依附于它的官僚买办资本垄断了中国的经济，使中国逐渐沦为它的附庸，民族资本在多重压力下举步维艰，整个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十分落后。而在政治上，治外法权的存

在严重破坏了中国法制的独立性，破坏了中国的主权。要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要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为此，刚刚成立只有一年的中国共产党就在党的二大上响亮地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的明确目标。

要推动中国革命，必须解决好统一战线问题

由于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间短，在国内的政治影响有限，要实现“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目标，单单靠自己是很难做到的。这时，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实现了合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孰料，当中国共产党全身心地投入革

命，投入到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投入到发动广大工农群众的时候，革命的同盟者——国民党及其领导者蒋介石却已磨刀霍霍了。

当时，国民党虽然完成了改组，但盘踞在广州的所谓革命的“盟军”，也“都是军阀式的军队，每一方都有自己的打算”。身在广州的勃拉戈达托夫看到：“所有这些‘盟友’瓜分了广东的地盘，搜刮当地的百姓，勒索捐税，以赡养这些军队的将领。这些‘军队’还用这种办法在物质上独立于政府。”想要竭力把它改造成一支统一的军队，却根本无能为力。勃拉戈达托夫直指问题的要害：“它们的名称改变了，但本质上没有多大的变化。湖南籍的军官想到第二军（原湘军——引者注）中去，云南籍的军官想到第三军（原滇军——引者注）中去，广州籍的军官则想到第四军（原粤军——引者注）中去。”至于个中缘由，作为近距离的观察者，勃拉戈达托夫也说得清楚：“这些军队的指挥官认为‘独立’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没有人为了所谓共同的目标放弃‘独立’，放弃自己的利益。到头来，“被视为服从政府的十五万军队只存在于纸面上”。

随着大革命的发展，随着北伐军不断向北方的推进，军队的状况愈发糟糕。当北伐军胜利地进占一个地方以后，勃拉戈达托夫惊讶地发现：“所有当地的资本家和地主一下子都成了‘革命者’，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喊出很左的口号。”“很多将军从军阀

的阵营中转到了国民革命军一边，但他们不是‘出于真心’，而是出于暂时的考虑。”勃拉戈达托夫充满忧虑地说：“国民革命军完全被这些过去的各派军阀指挥的杂牌军队吞没了。”试想依靠这样的军队想取得革命的胜利，无异于痴人说梦。

再看这支军队的总司令——蒋介石。勃拉戈达托夫在国民革命军中和蒋介石有过多次接触，对蒋的为人、处事都有密切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对蒋介石，勃拉戈达托夫评价说：他“深知‘有实力就有权’的著名信条。他以黄埔军校的干部为基础，着手建立‘自己的势力’”，而“在实施自己的决定时总是秘而不宣，有时不顾一切”。勃拉戈达托夫不止一次地强调“蒋介石竭力想建立他的个人独裁”。勃拉戈达托夫犀利地发现：当形势不利时，蒋介石“对自己的独裁作风和神气十足的架势”可能有所收敛，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独裁欲望”，“他在竭力为实现这一目的做着准备，同时又巧妙地对此进行伪装。他大力网罗同伙，结党营私”。而一旦到了关键时刻，他就能一方面为自己争取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一方面争取到以江浙财阀为代表的大量金融资本的支持，从而毫不犹豫地抛弃甚至屠杀掉昔日的盟友，走上个人独裁的道路。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背叛，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终还是失败了，勃拉戈达托夫也在此后离开了中国。但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不但要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而且要始终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争取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同时，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坚持武装斗争，组建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和指挥的军队。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1 年第 2 期目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专题·“十四五”规划研究	
新发展阶段如何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十四五”时期中国区域发展格局变化趋势及政策展望	
韩庆祥		邓仲良等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十四五”时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展望	
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百年历史经验研究		孙久文等	
马克思主义		法学	
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的恩格斯辩证法		法治一体建设地方试验型模式研究	
“生态问题意识形态化”批判		章志远	
王金水等		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的历史进程、时代特征与实践路径	
王亚华等		莫文秀	
中国后扶贫时代中的返贫风险控制策略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	
——基于风险源分析与人力资源开发视角		“一带一路”境外合作区高质量发展：理念、实践与实现路径	
萧鸣政等		李进峰	
		容错机制何以发挥激励效能？——基于多政策文本及其实践应用的实证分析	
		陈 朋	
		技术迭代背景下领导干部创新意识维的生成逻辑、运作机理及实践要求	
		王舒曦等	

《行政管理改革》2021 年第 4 期目录

【本刊专稿】		革新要求	
中国古代乡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史鉴管窥		鲁全	
张晋藩		【乡村建设】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乡村建设中的农民主体性提升——基于角色互动理论的 Y 村案例分析	
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健的中国道路		周立 庞欣等	
刘远立		中国百年乡村建设的历史沿革与有效性初探	
王 晓莉		【政府管理】	
【本期关注：“十四五”规划专题研究】		系统论视阈下教育现代化发展政策调适体系构建	
“十四五”时期我国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的目标与任务		郭滇华 杨春芳	
关信平		从工业化就业到数字化工作：新工作范式转型与政策框架	
守正、发展与创新：“十四五”时期医疗保障的完善思路		杨伟国	
仇雨临 王昭茜		论作为监管激励机制的企业合规——兼论“十四五”时期社会保障改	
新时代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路径		孙春蕾	
——兼论“十四五”时期社会保障改			

换届中选好干部配强班子

□ 吕红娟



从今年开始，我国地方领导班子将自下而上集中换届。这次换届产生的新一届领导班子任期与“十四五”高度契合，担负着应变局、育先机、开新局、谋复兴，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历史重任。此次换届意义重大。如何按照党中央部署，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高标准高质量做好换届各项工作？近期《中国党政干部论坛》针对换届中的热点问题，邀请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共同探讨。

选好干部、配强班子，是换届工作的重中之重。天津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喻玉林在《高质量做好换届工作应遵循的五个原则》中指出，着力建设政治过硬、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领导班子，要遵循五个原则。一是突出德才兼备，着力把好选人用人关，确保选出来的干部政治上忠诚、能力上过硬。二是突出供需匹配，着力为事业选为事业用，从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侧”着眼，从干部培养选拔使用的“供给侧”发力。三是突出增强功能，着力优化领导班子配备，使领导班子结构有格局性、整体性的改善提升。四是突出关键少数，着力选优配强党政正职，把班子带起来，推动一方发展，造福一方百姓。五是突出长远发展，着力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着眼未来 5 年、10 年、15 年乃至更长时间发展需要，加强系统谋划布局，加大培养选拔力度，真正把优

秀年轻干部选出来、用起来。

高质量做好换届工作，首要任务就是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特别是把党政正职这个“关键少数”中的关键选优配强。如何选优配强党政正职？云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小三在《选优配强党政正职是新时代领导班子建设的首要问题》中予以回答：要坚持事业为上，严格党政正职选配“度量衡”，从政治上、本领上、实绩上有更高标准、更严格要求，确保德配其位、才配其位，以队伍高素质保证发展高质量；要突出精准科学，配出党政正职团结干事“好搭档”，既要注重人岗相适，又要注重能力相长，还要注重个性相容；要注重战略谋划，建好党政正职干部储备“蓄水池”，既要高度重视以换届为契机选优配强党政正职，更要着眼长远，在换届中发现“好苗子”，加强平时培养。

发现好干部是干部选任链条的初始环节，及时发现好干部是合理使用好干部的先决条件。如何才能发现好干部？中央纪委研究室原副局长纪律检查员邵景均在《换届中怎样发现好干部》中认为，及时选用符合新形势新任务要求的领导人才，是我们党 100 年成功经验的基本总结，也是实现“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的迫切要求。选任干部，首先要发现好干部。在换届中发现好干部，前提是正确把握新时代好干部标准，要有“求贤若渴”的愿望，拓宽发现好干部的渠道，改进识别好干部的方法。此外，还需要发挥制度优势，排除各种干扰，为发现和选用好干部创造良好的环境。

从 2021 年开始，全党 3000 多个地方党委需要陆续换届。在换届前后，干部的调整包括“提拔”相对密集。在这个当口儿，研究总结我们党防止干部“带病提拔”的成功经验，正当其时，十分必要。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教研部教授刘炳香在《地方党委如何防止干部“带病提拔”》中指出，防止干部“带病提拔”，当务之急是精准识别干部，这是果断挡住“带病”干部进入提拔程序或中止其提拔程序的前提；治本之策是把干部

管理纳入全面从严治党整体布局中，促进大批高素质专业化干部成长起来，把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使“带病”干部无法形成气候，难以得势重用；亡羊补牢是依规依纪，追根溯源，严肃问责“带病提拔”。这是事后补救措施，也是阻止干部“带病提拔”重复发生的关键环节。

换届中能不能选出改革派、实干家，组建一个好班子、打造一支硬队伍、展示一个新面貌，关键在于换届工作中是否坚持鲜明的政治态度、规范严谨的法定程序、科学有效的工作机制、严肃认真的纪律要求。中国人民大学当代政党研究平台研究员陈家刚在《维护换届工作的严肃性重在落实党内法规》中认为，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用党内法规维护换届工作的严肃性，能够有效克服选人用人工作中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积极修复地方政治生态、消除干扰破坏换届的风险隐患、应对换届期间出现的各种突发性问题，真正在制度的轨道上实现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

换届之年，干部的进退留转不可避免。如何正确对待进退留转？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教研部党的领导与领导科学教研室主任胡月星撰文《正确把握和引导换届前后干部心态》从心理学层面予以探讨。他认为，领导干部积极健康的心理状态对于顺利开展换届选举工作，如期圆满完成领导班子的新老交替，营造政通人和、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环境，确保换届年各项工作开好局、起好步至关重要。引导换届前后干部心态，激发心灵能量，要涵养正气，提振“精气神”；要转换思维角度，提升自我认知力；要克服僵化心理，增强心理灵活性。

